

■散文

母亲

李凤晴

一觉醒来,太阳已从茅草屋的南窗把金色的手指探到了印着大红花的被子上,老旧的床铺一下子鲜亮了很多。楼下妈妈扯着嗓门喊:“小懒虫,太阳都晒屁股了,还不起来!”我吓得一骨碌爬起来,踩着土楼,用极快的速度跑到堂屋,母亲斜着眼睛瞪了我一下,我慌忙拎着笨重的铁制洗脸盆,朝火塘上吊着的黑茶壶蹦去,茶壶盖子被红红的火苗舔得“噗噗”作响,满屋子都是母亲在大锅灶上煮饭的热气,我手忙脚乱地要去倒茶壶里的开水,母亲跑过来一把将我拎开,把洗脸水给我兑好,说:“站过去,小心烫着啊!”我小心翼翼地洗完脸,母亲嘟囔着从柴火灶的锅洞里夹出一个焦黄的饭团,然后鼓着腮帮子把饭团上的灰吹干净,用菜叶子包好了递给我,我“咯咯”地笑开了花……

那年,母亲带着大家子人把分配的田地种完了,又到处去开荒种地,仅仅一年时间,母亲就让我们一家人都吃上了白米饭。再后来,母亲用自留地种菜,吃不完就挑到很远的厂子里去卖钱,然后又用卖菜的钱,给我们姐妹几个买花布做衣裳。母亲总是挑灯夜缝,就为了让她的儿女都能穿上新衣裳。后来,母亲把卖不完的菜用来养猪,看着母亲大挑小挑地担菜、担水、担猪粪,一锅又一锅地煮猪食,小小的我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唯一能帮母亲的,就是努力到山上背柴,努力到地里割草喂猪。每次割草被雨淋湿的时候,母亲总是扯着嗓门喊:“叫你下雨的时候要去躲一躲啊!你咋个这么笨呢!”母亲边吼边帮我擦头发换衣服,然后,我就会“咯咯咯”地笑个不停,母亲总是无奈地笑着说:“你这个调皮的小丫头!”再后来,我们家的茅草屋终于换成了大瓦房。可是母亲的头发也开始白了,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了,而我开始在学校寄宿,帮母亲割草背柴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每周或者每月回去一次,母亲总是把炒好的腊肉和咸菜,一瓶又一瓶地装在我的书包里。每次回家,母亲都会站在村口等我;每次离开家,母亲都会依依不舍地看着我远走……

后来的后来,我离家越来越远了,远



到了自己的家,远到变成了当年的她,远到每次回老家,只想跟母亲多待一会儿,远到母亲佝偻着背,依然要在村口等着我回家,远到母亲撑着拐杖依然要坚持送我到村口,远到我每次走的时候不敢回头,因为我怕我的眼泪模糊了母亲的脸,更怕母亲的眼泪模糊了我的眼……

八月的一个早上,我接到了哥哥的电话,说母亲没了,我瞬间僵住了,说不出话,大脑一片空白。我站在车旁,像极了一个木头人,装货的师傅喊了我好几遍,我也没有反应过来,只感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拼了命地往地上掉。我把电话挂断,慌慌张张跳上车朝老家的方向赶。瓢泼的大雨下了一路,水汽模糊了车窗,我一路眼泪都没有停过。我感觉世界静止了,只有我开着车子在路上跑,一路上我只听到自己呜咽的声音,眼前都是母亲的样子。在熟悉的路上我迷了路,绕了一圈又一圈。进门看到母亲的遗体,我的伤心都成了无声的崩溃。两天后,母亲的遗体火化了,我的心痛得无法呼吸。母亲的骨灰被安葬在墓地,我含着眼泪回到了自己的家。从那天起,我昏昏沉沉地度过了四十多天,无法接受母亲离世的事实。后来,我慢慢接受了母亲的离世,清醒地告诉自己要好好生活,因为这是母亲一直以来的遗愿。

清明节,我回老家给母亲扫墓。村

口路边的树木,仿佛一夜之间都变绿了。我驾驶着车子,驶

过村口的拱桥,拱桥旁边的石头上空空如也,再也看不到母亲的身影。记得去年的今天,母亲听说我要回家给父亲扫墓,她便走到拱桥边的石头上坐着,眼巴巴地等着我。如今,独自走到村口母亲种过的菜园。脚下的青草软绵绵的,绿油油的;沟边的野芥菜,密密匝匝地生长着;菜地里的几朵小黄花,在风里轻盈地摇曳着,似乎一切的一切,都还留着母亲的气息和身影。菜地旁的田野里,姐姐种的蚕豆充满了丰收的喜悦;一只喜鹊在池塘边的杨树上,叽叽喳喳叫个不停;中午的太阳,明晃晃地照在池塘里,水面泛起一道道白光;不远处那簇粉色的月季花,无忧无虑地在院墙里盛开着。

记得上一年清明节,母亲打开院墙的大门,拉着我到月季花下坐着乘凉,还笑盈盈地采了一大把月季花给我,说:“月季花跟你最配了。”如今院墙的大门紧锁,我只能远远地看着、想着,不经意已是泪眼婆娑。杨树上的喜鹊还在叫唤着,几只蜜蜂围着我嗡嗡作响,脚下的青草发出一阵阵浓烈的草香味。俗话说“娘在家就在”,如今,我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野孩子,归来已经物是人非,只剩满心怅然。桥还是那座桥,只是桥头再也没有了母亲蹒跚而来的身影……

■散文

母亲的照片

曹水春

元宵节前的一天,四弟打电话来,要我把母亲的那张照片发给他,他要用AI技术把母亲的那张照片好好地修饰一下。这些年,因为对四弟一直好高骛远、不踏实做事有看法,加之其他一些难以言说的缘由,便很少与他见面或联系。偶尔接到他的电话,也只是和他随意聊几句便挂了。这次却不一样,听四弟这么一说,我虽然没有和他多聊几句,心里却涌上一股暖流。我随即告诉他,我会尽快去电脑里找这张照片,找到后马上发给他。

四弟要的这张照片是母亲的遗照,也是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。我在电脑里找母亲的这张照片,快速从微信里发给四弟。照片上的母亲瘦弱得很,看着看着,我的眼睛湿润起来。

在我最早的记忆中,母亲什么都好。她性格开朗大方,心地善良,和街坊邻居们都能和睦相处,从没因什么事和别人红过脸。那些年,生活很艰难,要做什么没什么,但她在苦涩中对自己的儿女们倾注了所有的爱。每当夜深,我们哥几个饥肠辘辘睡不着觉的时候,母亲会悄悄出现,饱含深情地讲七仙女的故事给我们听。我们听着听着就忘记了饥饿,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母亲唯一不好是她的身,成天咳嗽,还喘得厉害。听外婆说,母亲年轻时的身子骨可好了,什么农活都会干,还掌握了制作糕点的好手艺。母亲是在我出生不几天的那个隆冬时节落下的病根。有一年的腊月天,隔壁胡家的水生大哥结婚请客,母亲前去帮忙。那时候,大哥还没有和胡家的水香姐姐定亲,母亲却倾尽全力地帮忙,一边咳嗽着一边忙这忙那。当晚,母亲的两只手就剧烈地疼痛起来,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。

母亲患病以后,父亲多次带她到城里的医院去看,可每次看了都不见好转。尽管这样,父亲依然到处寻医问药。听说石林路美邑乡有位草药医生是治疗风湿病的高手,便借了辆单车,独自骑行几十公里,找到那位草药医生,抓了几大包草药回来熬给母亲吃。遗憾的是,所有对别人有效的单方偏方对母亲都没有效。

母亲的病越来越重,父亲倾尽全力却无可奈何。母亲由于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,虽然性格刚强,有时也会格外悲伤。

那是我上高中时,父亲、大哥和二哥带着母亲再次到地区医院看病。母亲想到自己已经病得皮包骨头,快不行了,想请医生安排住院治疗。父亲、大哥和二哥也都请求医生让母亲住院治疗,可医生却说这是严重的慢性病,住院治疗没有任何明显效果,只能在家慢慢调理。回到家,母亲放

声大哭。

母亲这次看病后的一天晚上,我下自习回到家,见父亲蹙着眉,便问他怎么了。父亲声音低沉地说:“我想带她去照张相。”

那年的仲秋时节,天刚放晴,生产队就收了一些先熟的稻子分给各家各户尝新。看着新稻子,母亲捻了捻,笑眯眯地说:“看你们哥几个这馋猫样,要是在太阳底下晒干啊,恐怕等不得。”说完就指挥着我们哥几个在大灶上生起柴火,慢慢地一锅一锅把稻子炒干,然后背到生产队的碾米房用碾米机碾成米。晚上就煮了一大甑子新米饭,一家人围着饭桌,就着煮青芋头,别有一番滋味。

第二天中午,二哥带他的好朋友赵成所来尝新。赵成所在城里工作,衣着很时尚,肩上还挎着一个用黑皮套子套着的照相机。吃饭的时候,赵成所一会儿聊社会上的一些新奇事,一会儿又取出照相机,一边说这个照相机是上海产的、国内最好的海鸥牌135照相机,一边介绍怎么调光圈、调焦距。我听得云里雾里的,什么也不懂,却又十分喜欢听他们聊。

吃完饭,二哥想请赵成所为母亲照张相。赵成所一听了,说用这种照相机照相很简单,由二哥来为母亲照相最好。二哥看来是心里有了底,一点都没推辞,说了声“好啊”,就高兴地站起身,扶着母亲往后门走去。母亲在二哥的搀扶下,边走边说:“别照了,病成这个样子还照什么相?照出来丑死了!”二哥朗笑着说:“不会丑!你今天精神特别好,照出来会特别好看。”我也乐滋滋地附和二哥,劝母亲一定要照这张相。

说笑声中,我们一行人已来到房屋后的院子里。这时,已是正午,烈焰般的阳光火辣辣地从天空斜射下来,地上翻腾着一道道白晃晃的热浪。赵成所指导二哥调好光圈,做好了照相前的准备。为了不逆光,二哥让母亲背向西边云机五厂方向,紧靠着后院花台上那丛稀疏的竹子,面朝我们家的房子站立着。母亲配合得很好,在长期病痛折磨下十分难得地露出一丝喜色。二哥一见,咔嚓一声按下快门,为我们留下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
今天上午,四弟把母亲那张修饰好的照片发给我。我打开一看便惊叹不已:这哪是用一张老照片修饰出来的?这分明是一张真到不能再真的照片!那眼睛、那下巴、那皮肤,那头饰、那衣着,那刚毅沉稳而又洋溢着笑意的神情,分明是母亲幽兰般清丽纯粹容貌的活现啊!

端详着母亲这张特别精美的照片,我自言自语地说:这一切,来自天意,也来自爱意啊!

山野里的春天住在心里

梅如月

二十多年前的春天,我背着一只褪了色的帆布包,走进了那座藏在山坳里的学校。那年春天来得晚,风还带着刺,教室的窗纸哗啦啦地响,我站在讲台上,看着下面那些被山风吹红了脸蛋的孩子们。

我来之前,学校里没有音乐课、美术课,唯一的、响彻整个山坳的声音,就是孩子们稚嫩却卖力地反反复复唱着那句电视里听来的主题曲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”。老教师们的严谨与温和,像山间沉静的雾气,笼罩着校园。孩子们远远见到他们,会停下脚步,恭恭敬敬喊一声“老师好”,那声音里满是敬重,却也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溪流,清澈透明,但少有嬉闹的浪花。我的到来,像是忽然投进池塘里的一颗石子——我会在课间和他们一块儿跳绳,输了就老老实实学青蛙跳;会在体育课上一起追着破旧的篮球满场跑,跑得满头大汗;会在放学后,坐在操场边的石阶上,听他们说家里新下的猪崽狗崽,说后山那棵树上鸟窝里有了蛋;会教他们唱《栀子花开》《一生有你》《白桦林》《丁香花》。

我不太像老师,倒更像是突然多出来的一个大朋友。他们不再远远地喊“老师好”,而是“小金老师”“哎!老师”地叫着,喊完自己先咯咯笑起来,像得了什么了不得的胜利。

就是在那样的亲近里,春天悄悄铺满了山野。

那时候,经常要带孩子们上山打柴,学校的灶要靠这些柴火煮饭。孩子们从家里带来背篓、柴刀和绳子,我跟在他们后面,学着辨认哪种树枝易燃,哪种耐烧。山路陡,柴捆重,我虽是大人,却总是落在队伍最后头,喘着粗气,汗湿透了衬衫。总有几个孩子慢下脚步,等我赶上,或是不声不响地从我背篓里抽出几根粗柴,塞进自己的小背篓里。

“老师,你歇口气。”“这段路平,我帮你背一截。”

我推辞,他们就笑:“你讲课行,打柴可不如我们哩!”说完,小小的身子一弓,背着几乎要盖过头顶的柴捆,脚步又轻又快,像山里的野山羊。那时我忽然觉得,在这条蜿蜒的山路上,我才是那个被照顾的学生。

雨季来临时,山林又换了一副模样。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腐殖土和青苔的味道,这是捡菌子的季节。孩子们成了最好的向导,边打柴边教我辨认那些从松针下、树根旁冒出来的“小伞”。

“老师你看,这是青头菌,帽子青绿青绿的,最好吃,可以生吃,也可以烧了吃!”“这种叫见手青,摸到它会变青色,一定要炒熟,不然吃了会看见小人跳舞哩!”说这话时,孩子故意做出摇摇晃晃的样子,惹得大家一阵笑。

“干巴菌最难找,也最珍贵,我们可舍不得吃,都捡了卖钱买作业本!”

他们如数家珍,哪个坡头的松林爱出牛肝菌,哪片栗树林的干巴菌最多,雨后第几天最容易捡到鸡油菌……这些知识,是祖辈传下来的,是山林教给他们的,如今又细细地说给我这个“城里来的老师”听。我跟着他们,学着用树枝轻轻拨开松针,发现那些或棕或红或黄的菌子时,竟有种寻到宝贝的喜悦。那些被小心放进篮子里的,不只是山珍,更是他们愿意与我分享的、关于这片土地的秘密。

学校孩子们的宿舍是由原来的废旧教室改造的,里面是大通铺,二十几个孩子挤在一起,被褥颜色深浅不一,都带着经年的潮气和孩子们身上山野的气息。我第一次走进时,那混杂着汗味、泥土味和脚臭味的空气,着实让我顿了顿脚步。但我没退出去,我看见那些横七竖八的被子,看见孩子们乱蓬蓬的头发,看见

他们指甲缝里的黑泥——那都是他们帮家里干活、在山野奔跑留下的印记。

我卷起袖子,一次次耐心地教他们怎样把被子叠出棱角,怎样把床单拉平整,怎样把脸盆毛巾摆成一条线。有几个小女生的头发总是乱糟糟地扎着,我让她们搬来小凳子坐在屋檐下,学着给她们编辫子。我的手笨,起初总是扎得松垮垮的,她们却高兴得很。

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在教室里批改作业,桌子旁边围满了孩子,我边改作业边和他们聊天,看着窗外的春天顺口说:“这个季节,就馋香椿炒蛋。可惜家里没有椿树,街上卖得又贵。”说完自己也笑了,像是自言自语。

第二天早上,我推开门,愣住了。

门口放着一只小竹篮,里面是嫩得能掐出水的香椿尖,紫红里透着油亮。还没回过神来,又来了一个孩子,背着几乎和他一般高的小背篓,摇摇晃晃地走来,轻轻放下——又是一背篓香椿。接着是第三个、第四个……有挎着竹篮的,有用围裙兜着的,有直接捧在手里的。那些沾着晨露的椿芽,在我门前堆成了一座小山。

“老师,这是我家的。”我家后山有好几棵呢。“我天不亮就去摘了!”“老师,这样够吃了吗?”“不够我明天再去!”

我张了张嘴,双眼噙着泪珠,什么也说不出来,转身跑进屋里,抬出那只平时洗衣服用的大铝盆。椿芽装进去,冒了尖,满屋子都是那股特别的、清冽的香气。

三年后,我离开了那里,往后的岁月如河流奔淌,每当春天,市场上出现第一把香椿,或者山野里瞥见一树马樱花,甚至只是看到一捆捆整齐的柴火时,那座山村小学、那些红扑扑的脸蛋、那些从我的背篓里“偷”走几根柴的细瘦胳膊,就会一下子涌到眼前。

